多种文化背景的人多一些交流，学会尊重差异、尊重他人，学会合作，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十分珍贵——

当青春遇上远方

□ 熊 丽

于震京用网兜从河里捞起一些浮游植物，凑近脸盯着瞧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倒进准备好的盒子里。“Jerry，北京也有这样的虫子吗？”一旁的澳大利亚同学问。“不，我们在地理课上，一般不做这种实验。我们的情况是不同的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他解释说，“你知道的，北京在北半球，这儿是南半球。”

不同的不仅是虫子，还有教育理念。

来自北京市八一学校的高中生于震京今年17岁，这是他在澳大利亚互换生活的第3天。在中央电视台今年暑期推出的这档中外教育互换真人秀节目《青春季》中，和他一样，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各4名中学生，互相到对方国家生活半个月，体验不同的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生活，直面真实的文化冲击和各种不可预知的艰难挑战。

中外教育“对对碰”

生活互换类的教育真人秀，此前并不鲜见。比如湖南卫视的《变形计》，就引发了人们对城乡文化差异的思考。《青春季》关注的，则是中外教育差异这一热门话题。

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林妙可、北京市十五中的裴梓原、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尚思乔以及于震京，4个孩子中最小的16岁，最大的也只有18岁。“这一代孩子，可能从小吃的东西、玩的游戏、看的电影、用的电子产品，掌握的信息已经和西方的许多国家别无二致。可能他未来的生活，工作，也不仅仅是局限在中国大陆之内，而是更大的一个国际性舞台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拍这样的片子显得更有价值。”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齐竹泉将8个孩子称为被“投放”到异国的中学生，他们的表现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的样本意义。

担任校学生会干部的于震京有“学霸+体霸”之称，他在澳大利亚的表现同样令当地老师同学“震惊”，而悉尼纳罗宾体育中学独特的数学课也令他印象深刻——数学老师为了讲解什么是抛物线，把同学们带到操场上扔东西，进行直观体会。

来自澳大利亚莫斯曼中学的Lexie是第二次来到中国，但在深入地感受了中国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之后，却让她有些难以适应——中国中学生每天早上七点就要起床，一天要上八节课，学习那么多知识。“在我们学校，每天一般只有四节课，有时只有一节课，上午没课时还可以睡到十点钟。”据了解，在澳大利亚式课堂上，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修课程，上课没有固定教师，没有固定座位，一个班一般只有十多个孩子。

北京八一学校副校长王华蓓说，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在思考：如何在课改的背景下，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？仅仅是自由开放，是不是适合未来教育的发展，怎样能够让自由的选择和扎实的基础教育相结合？

而在学校教育之外，家庭教育的差异也令中国学生有别样感受。裴梓原寄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五口之家，因为个性独立、性格开朗、英语流利，很快就和家里的3个孩子成为了好朋友。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澳大利亚家庭的亲子关系。“我们吵架的时候常常发泄似的大声嚷嚷，但他们很多事情都商量着来，孩子在家里非常自由，而且从这种自由里大家都感觉到了快乐。”相比之下，她觉得中国的家长似乎更喜欢管孩子，爱操心。

裴梓原在回国后将这些想法与母亲陈瑾进行了交流，对母亲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——我有困难我会求助于你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请让我自己做。“我们做家长的，总怕孩子在大方向上有偏差。不过她已经长大了，我对她还是挺有信心的。”陈瑾说。

中外教育理念到底孰优孰劣，争议常有，难有定论。近年来，在对西方快乐教育的“仰视”中，严厉的中式教育似乎且战且退，但其坚定支持者并未退缩。几年前的“中国虎妈”蔡美儿声震美国，她认为严厉的中式家教比宽松的西式教育优越，魔鬼式的训练是成功的关键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虎妈猫爸》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，在一篇被广泛转载的《海外华人看虎妈猫爸》的文章中，一位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，在美工作4年的妈妈看了此剧后称，“感谢国内教育的狠”。

事实上，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与文化传统紧密相关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我们既要认识发掘本国优秀的教育传统，也要积极吸纳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，从广泛交流中受益。

青春在蜕变中成长

青春，是个不断叩问和塑造自我的过程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、首席专家孙云晓说，青少年是在体验中长大的。我们身处一个多元化的时代，一个开放的世界，多种文化背景的人多一些交流，学会尊重差异、尊重他人，学会合作，对于成长来说十分珍贵，有助于提高他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。

不同文化的冲撞带来了对自我的重新认知。在节目中，学生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外，还要完成各项大大小小的任务。裴梓原需要办一场与澳大利亚有关的画展，而且要求采用多种美术形式，其中有些她并不擅长。因为画展与学生坐班车回家的时间冲突，来看的人不太多。裴梓原觉得自己是代表中国去的，画得不好，“有点丢脸”。她说，“从一开始的对节目不理解到后来明白学习永无止境，所有磨炼都会让我进步。”

成长令人欣喜，蜕变中的痛苦同样值得关注。现实中，众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低龄留学生遭遇的实际困难，比裴梓原他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遇到的更多更难。

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，近年来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日趋明显。由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《2014中国留学发展报告》显示，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美国最大留学生源国，同时，中国留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“低龄化”趋势：高中生已经成为继研究生、本科生之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群体。2013年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超3万人，这一数据10年内增加了60倍。自2007—2014年，加拿大、美国、澳大利亚和英国集中了90%以上的中国高中留学生。

作为曾经的高中出国留学生，广东白领万新亮告诉记者，十几年前自己第一次走出国门就是去留学，当时可以说是“两眼一抹黑”。当最初的新奇感退去，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中，没有家人朋友、语言的不适应、文化的冲突，都令年少的身心倍感孤独。从寄宿家庭到学校宿舍再到自己租房，这是一个痛苦磨合的过程。“用了将近一年时间，我才真正走出去融入当地社会。”

在万新亮看来，这些冲突几乎是普遍存在的，只是在强弱程度和个人的适应能力上会有所不同。他建议，对于那些计划出国的中学生来说，在作出留学决定前，可以通过一些交流活动或海外夏令营活动进行提前体验和考察，建立对国外人文社会环境的初步认识，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出国独立学习和生活，让理性留学代替盲目跟风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认为，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央，人们在不断地打量着中国的形象和未来，中国人自己也在不断反思。这种打量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孩子来判断和估量的。由此，我们应该尽可能为孩子提供开阔眼界、体验生活的机会，让他们在更广茂的环境中成长。

星期话题

木兰，我知道你冤

□ 韩 叙

最近，有条“娱乐新闻”当真“娱乐”。

先是喜剧演员贾玲恶搞花木兰，遭到了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批判。随后，贾玲道歉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原本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贾玲，认为其作品过于恶俗，而贾玲道歉后，舆论反倒分裂成两派。一派说，花木兰是文化当中的一个正面符号，不应被娱乐，甚至丑化；另一派觉得对民间传说进行再创作未尝不可，将其上纲上线是对艺术的扼杀。

于这个时代来说，无论是痛心疾首还是口诛笔伐，都如潮起潮落，很快偃旗息鼓。这个时代的好处是，凡事尽可游戏化，看个热闹，便作鸟兽散。不过于笔者而言，却感觉自己如同被人当头泼了一桶狗血，纵是洗干净了，心里仍有个疙瘩。何况，笔者实难以认同所谓“上纲上线”的评价，忍不住要说说。

要说木兰，那真是挺冤的。

据史料记载，木兰在我国历史上确有其人。不过，其生平的确是扑朔迷离，从北魏时期到唐朝、明朝、清朝，不少时代都出现过歌颂木兰替父从军的记载和文学作品，而且一会儿姓朱，一会儿姓魏，还有姓任、姓韩之说。堂堂一位巾帼英雄，连姓都传乱了，也难怪会被今人当成民间传说。

有了这个前提，前文的纷争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若将其当作一个严肃的文化符号，即便是喜剧演员要进行创作，怕是也会好好掂量一下分寸。换言之，怎样看待木兰，最终决定了我们对贾玲事件的判断。

木兰究竟怎样，是历史；我们怎样看待木兰，就是历史观。

史观一说，一直有狭义广义之分。狭义的史观讲究去伪存真，追求细节的真实，从微观层面还原历史。而广义的史观，则要从宏观上形成对历史的看法，也就是历史共识，简化后便是所谓的“文化符号”。二者各有侧重，且功能不同。但后者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显然更有意义。

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。杨贵妃的历史符号就是美女：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因为她姿色过人，才有“三千宠爱于一身”；才有玄宗皇帝不问政事纵情声色，以致军政大权旁落；才有安禄山拜其为母，却和“母”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后来安史之乱以及贵妃缢于马嵬驿的结局，都有其姿色的因素贯穿其中。这是广义史观的观点。

但事实是，唐朝以丰腴为美，北方尤甚，这一点，大把的宫廷仕女图可以作证。而贵妃好红妆，五代王仁裕在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上曾记载，“贵妃每至夏日……每有汗出，红腻而多香，或拭之于巾帕之上，其色如桃红也。”换句话说，仅从史实来看，倾国倾城的贵妃娘娘，在今天看来，不过就是一个浓妆艳抹的胖子，而且一出汗就掉妆。

如果真的作此判断，那便是狭义史观了。按照这一思路，安史之乱中三位男女主角错综复杂的关系，怕也和“爱江山还是爱美人”搭不上关系了，而是两个大权在握、嫌美爱丑的男人和一个外在不一定美、内在尚不知的女人之间的爱恨情仇，绝对狗血至极。

为什么一个浓妆艳抹的胖女人，经过历史的描绘，会变成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？是历史学家都疯了吗？显然不是。

以今天的审美来看，杨贵妃的容貌不过尔尔。但在她所生活的年代，她确是美女，而且美到祸国殃民。究其根本，不是她长了一张有争议的脸，而是时代在变，审美也在变。或者说，她的美，只是唐代审美的历史符号，不代表更早的过去，更不代表今天或者未来。指望她美得纵贯古今，确实是难为她了。

这就是广义史观告诉我们的道理。

木兰也是如此。放在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当代，木兰充其量也就是个女汉子。可放在古代，就只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了，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也没出几位，除了杨门女将等等，也只有木兰了，无怪乎史称其不让须眉。

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，就是史观的两个维度。是“就古论古”而后“以古鉴今”，还是“以今度古”，高下立判。

历史的车轮自有其前行的轨迹，身处其中的人也无法超越时代而存在。我们真正应当追寻的历史，从来都不是一个基于当下的结论，而应该是基于历史背景给出的客观判断。在历史的洪流中，行他人所不能成之事，即是能者；想他人所不能想之事，即是智者；破他人不敢触之樊笼，即是勇者。他们都是历史的推动者、书写者，值得更客观的评价，当得起我们更多的尊重。

木兰，你冤，我知道。

文化思语

镇馆之宝

辛亥革命纪念邮票

孙中山的飞机梦

□ 江志伟

让我们走进宝岛台湾的台北孙中山纪念馆，去了解一桩关于孙中山先生“设计辛亥革命纪念邮票”的鲜为人知的史实，并欣赏该馆的“镇馆之宝”——两枚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辛亥革命纪念邮票。

1912年元月1日，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，随即决定发行纪念辛亥革命的“中华民国”邮票。从《孙中山日记》中知悉，孙中山亲自参与邮票的设计，他在日记本上进行了设计工作。后来在邮票设计方案讨论会上，大家通过了他的方案，即：首次发行的邮票为两枚，一枚为纪念邮票(孙中山日记上将其称为“特别邮票”)，另一枚为普通邮票（孙中山日记上将其称为“平常邮票”）。会后，所有会议出席者在该页日记的反面签名，孙中山将此页日记撕下，交秘书唐文照办理。

这两枚邮票，其一是正方形、翠绿色的纪念邮票，入票主图为孙中山总统人头像，并有“中华民国元年”汉字和“Republique Chinois”（中华民国）的法文(法文是万国邮联约定的公用文种)，像的左右两侧是“光复纪念”四字，面值三分；另一枚是正方形、褚石色的邮票，入票主图为飞机图，以及“中华民国邮政”文字和“Republique Chinois”的法文，面值五角。总统像纪念票和飞机图普通票，当时都有试制样票。样票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，采用凹版母模直接印在道林纸上，不打齿孔，四周留有较宽的白边。

为什么孙中山要以“飞机”作为第二枚邮票的主图呢？研究者的共识是，这反映了他的科学救国思想。孙中山向往振兴实业和发展科学。二十世纪初，一般人只知飞船、飞艇，飞机还很少见到。孙中山把象征科学文明的飞机图印在邮票上，使这个新事物能为民众所知，从而激励人民掌握科学技术，振兴中华民族。

其实，以飞机作为这枚邮票主图，还与孙中山特别喜欢飞机有关，有史实为证。1924年7月，孙中山与宋庆龄去视察广州飞机场。孙中山当时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飞行部队，其负责人、航空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刚制成了一架飞机——据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。它的机身是三夹板的，机舱有两个座位，没有舱盖。那一天，这架飞机进行试飞，杨仙逸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到场观看。试飞后，宋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。孙中山便建议将这架飞机命名为“洛士文”号，这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。这张宋庆龄坐在机舱内的照片很快便发表在报纸上，反响强烈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政治风云突变，由于袁世凯篡政窃国，大总统易位，致使这两枚邮票只有样票，未能正式发行，也不为世人所知。虽然从早期文献资料中可查到相关文字记载，但是都没原图刊登。数十年来，海内外几代收藏家都未放弃过搜寻，这套未发行的邮票就成了寻无觅处的稀罕奇珍。后来，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密藏的中山堂历史档案中，人们找到了这组珍邮，并对外展出。于是，在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物什中，又增添了这两枚邮票；而孙中山先生，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亲自设计邮票的国家元首。

孙中山设计的邮票 江 苹摄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 范

责任编辑 敖 蓉 梁 婧

邮箱 jjrbzmzk@163.com